

（二〇一七年二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忆文革悲惨经历	高诵芬·徐家祯
【劫后反思】	联动历史的断忆	林小仲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六）	王复兴
【编读往来】	致《文革博物馆通讯》编辑部的信	谢定国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忆文革悲惨经历

• 高诵芬·徐家祯 •

口述：高诵芬（1918—2005），女，浙江杭州人。书香门第出身，自幼在家延师授读。年十八，嫁给同乡徐定戡（诗人、法学家），相夫教子，克尽厥职。

整理：徐家祯（1942—），高诵芬之子，语言学家、散文作家，曾任澳洲华文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等。

我家是共高祖以下几房住在一个大墙门内的。直到日寇侵杭，各房人家都避居外地，从此分散，不再在同一个墙门里住了。

我小时候听父亲说，不知哪一房做官的长辈触怒了清朝皇帝，听说要来抄家，于是其他几房人家为了自保，就在每房大门口都贴上“某房”的纸条，意思是大家已经分开，以免殃及池鱼。后来，风平浪静，并没来抄家，大家才放了心。

到我十二三岁时看了《红楼梦》，才知道抄家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贾府倚仗皇亲国戚的地位，做了许多丧天害理之事，罪有应得。谁知道过了三四十年，我自己竟也亲身尝到抄家的滋味了！

◇ 锣鼓声中，等待红卫兵上门

一九六五年年末，我丈夫中风了，从医院出来以后就在家休养。那时，每天都有几个私人医生上门来为他看病。为了服侍我丈夫方便一点，我们雇佣了一个男佣老李，每天早出晚归，来照顾我丈夫。那时，我们每天忙于照顾病人，对外面社会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竟然毫无所知，简直好像住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

到了六六年八月下旬的某一天早上，老李照例按照我的吩咐打电话去约各位医生来诊治，可是他来告诉我，每位医生都对他说：“老李，请你转告徐先生，上海今天开始，全市所有的私人医生都不许开业了。”

不一会儿，两位护士也来电说不能再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外面的局势已经如此紧张。幸亏老李不属于任何单位，他可以照样来照顾我丈夫；我家原来雇佣的女仆也仍在，所以家务暂时没有问题。

从这天开始，我即使待在屋里，也可以听见街上不时传来口号声和锣鼓声，日夜不停。又听见传说，愚园路上大隆机器厂的老板严庆祥家已经抄了家，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另一家杨氏药厂的资本家杨树勋也抄了家，家里的衣服都挂在阳台上展览呢。

杨家离我家很近，我知道杨先生的填房太太一星期前刚生了孩子，还在医院呢，现在抄了家，叫她怎么办呢？就好奇地去看看究竟怎样。到杨家门口，果然只见沿马路的阳台上挂满了皮货和五彩的绸缎、衣料之类，像商店的大拍卖一样。我心里一惊，想，怎么政府又变起脸来了？难道又要来一次整资本家的运动了？但转而一想，严庆祥和杨树勋都是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而且他们在五十年代的“五反运动”中都被评为过“严重违法户”，可能现在查出来又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所以红卫兵才去抄他们家的吧。

当时，我的四个孩子中，中间的两个都已经去外地读大学了，不住在上海。家里只有大孩子大学毕业后在教书，小儿子还在高中念书。那天小儿子回来说，他的一个同学家也被抄了，而且还逼他有病的母亲在前园挖掘草地、花圃，怀疑他们在地下埋了金银财宝。那同学的家长我也认识，她家是开一家有名的肥皂厂的，祖父在抗战时因为爱国而被日本兵枪杀，所以她家一直被政府列为“爱国资本家”，连后代都被看做“烈士子女”；那同学的母亲一向十分积极，在工商界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怎么现在政府竟可以如此翻脸不认人呢？

不一会儿，我大儿子也从学校回来了。他说，今天他带学生下厂劳动，回家时看见红卫兵在路上剪路人的裤脚管，说是“小裤脚”；也脱路人的皮鞋，说是“尖头皮鞋”，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有的女孩子的裤腿被剪破了，只能在路上哭；脱了皮鞋的人只能赤了脚回去。他说，明天开始他不穿皮鞋上班了，要我找一双布鞋出来。我听了更加觉得大惑不解了，但总不相信我们自己也会遭到如此厄运。

再过了一两天的一个晚上，忽然锣鼓声敲到我们弄堂来了。原来是我们自己厂里的红卫兵来抄在我家隔壁住着的三叔公的家了。我们吓得连忙把整幢房子的灯全都熄灭，天真得以为红卫兵看见隔壁没有灯火就以为没有人在，就可以逃脱临头大祸了！

我们当然也不放心三叔公，就全家都聚在我小儿子二楼的房里，从窗口看隔壁的动静。我们只看见三叔公家上下三层楼全部灯火通明，屋里人影幢幢，但看不见他们在做什么。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忽然红卫兵都到他们屋前的草地上去了，正把东西从屋里搬出来，然后就点起熊熊大火烧了起来！火光到很晚才熄灭。我们正在等红卫兵的锣鼓敲到我们这儿来，不料只听见人声倒渐渐远去了。

徐家的企业一向是由二位叔公经管的，他们从来奉公守法，这我很清楚，怎么也会被抄呢？我真越想越糊涂了。第二天一早，我就从我们院子通三叔公院子的那扇小门走过去慰问三叔公一家。他们说，昨天厂里的红卫兵来，主要是“扫四旧”，把一些他们认为是“封、资、修”的文物、书画、器皿砸的砸，烧的烧了。金银财宝都封存起来，说不许动，但没有

拿走；至于存折、现金则没有拿，所以生活还不至于有问题。而且，三叔公告诉我，同一天夜里，住在跟我们同一条街上的二叔公家也被厂里的红卫兵抄了。至于我们家没有来，可能是时间不够了；也可能因为我丈夫从来不参与厂里的经管，所以红卫兵不知道我们就住在隔壁；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就不知道了。

我回来把情况一说，全家才知道可能真的要事到临头了，应该想个对策。大儿子坚决主张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藏起来，坚壁清野，一样都不让红卫兵拿去。他还年少气盛地说：“如果红卫兵来，我们就对他们说：‘我们家一样东西都没有，你们不信就抄吧！’他们找得着，算他们运气；他们找不着，算我们运气！”

他还说，他知道我们房子二、三楼有四间大卧室的壁橱顶上都有密室，外面看上去像是木头的天花板，但推上去却又有一层，好放很多东西。

我却犹豫不决，觉得如果红卫兵来，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一定不会相信。如果他们找不到东西，恼羞成怒起来还会动手打人。不是最近传来过很多红卫兵打死人的消息吗？这样做太危险了。

但大儿子和小儿子都主张把东西藏起来，我无法阻止他们，结果他们花了一个上午，把家里的金银财宝、现款、存折、手表、照相机、皮货、文物……反正可以搬得动，放得下的东西都塞进几个密室里去了！

刚做好准备，严阵以待红卫兵的抄家，谁知当天晚上大儿子却回来对我们说：“好了！好了！上海市委发表了十条通知，说红卫兵抄家是不对的，以后不允许再这样做了！”

我一听很是高兴，想，大概我们家可以保住了，于是叫儿子们把藏着的东西都拿出来。不料，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说红卫兵“把地主、资本家藏在黑暗角落里的变天账、金银财宝抄出来，亮在光天化日之下，好得很”。那就等于给红卫兵的抄家行动撑了腰。我的儿子还来不及重新把东西藏回密室，当天晚上我们家就着了吧！

◇ 两路红卫兵，一夜光

那天晚上八时许，锣鼓终于敲到我们后门口了。后门敲得“嘭嘭”响，我知道一定是红卫兵上门来了，就由儿子们去开门。进来的是我们自己厂里来的十几个戴着红臂章的红卫兵。领队的看样子是干部，说是“扫四旧”来的。我迎上去说：“我丈夫中风了，躺在床上，不能起床，请你们多照顾。”

他们说：“我们知道！”就要我们一间间房让他们检查，还要我们把金银财宝都拿出来给他们看。我知道这时候再躲躲藏藏也没有意思了，反正前几天藏东西时都已理好，就叫我的儿子把箱子间的门打开，把装我结婚时陪嫁的一大福建漆皮箱的银器和两个装首饰的铁箱都抬到二楼大儿子的房里去。几十年来，那套银器几乎从来没有动用过，连手环上扎着的红绿丝线都还在呢！铁箱里盛的则是我结婚时三朝那天娘家送来的首饰、我婆婆遗下的首饰、我丈夫出生时、我孩子出生时亲友送的金银琐片，以及我丈夫买给我的首饰，等等，还有我结婚时亲友送的见面礼几百块银元也在里面，有几块上面还贴着“喜”字呢！想不到那些东西竟落了这样一个下场！

红卫兵又让我把存单和现金也拿出来，他们一一点清，还叫我大儿子再核实一遍。在一部分红卫兵清点金银财宝和存款、现金的同时，另一部分红卫兵则已拿了我的钥匙从楼下到四楼平台一间间房打开来检查了。他们把我们的衣服、照相机、收音机、录音机、手表、衣料、绣货、皮货、文物、洋酒、成套的瓷器等等，等等，凡是起一点眼的东西全都搬到二楼和三楼的大房间，一件件检查；要拿去的東西就登记下来。

正在忙乱时，后门又“嘭嘭嘭”地敲打起来。我儿子去一看，原来大儿子学校的红卫兵也来了。他们一进门就知道厂里的红卫兵已经捷足先登。学生到底斗不过工人。两方面商量了一下，大概达成了协议：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让工厂的红卫兵拿去，学校的红卫兵就拿他们剩下的“四旧”。

学校的红卫兵和工厂的红卫兵一共总有三四十人，他们分散在我们三层楼十多间房间里：有的清点，有的搬运，有的查抄，有的撕、砸，有的看守我们不让我们“串通”，有的却在书房里借检查书籍之名欣赏起来了。他们看到二楼书房里有一套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共精装几十册，一边指着人体画说：“看，有黄色画片！”一边却看得津津有味。学校的红卫兵还拿我们饼干箱里的饼干、糖果大嚼起来。整栋大房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灯火通明，亮得像水晶宫一样。

这时，老实说，我们倒真正已经把身外之物置之身外了。反正事情已经到了这一田地，我们还能做什么阻止事情的发展呢？他们要怎么就怎么吧。我和儿子偷偷对我丈夫说：“你躺在床上装作不会动的样子。一切由我们来应付。”

其实，经过半年多的疗养和医治，那时我丈夫的手脚基本上能活动，也能自己起床行动了。但我们既然这么说，他就躺在床上装死。红卫兵以为他中了风，已经半死，倒也没有怎么难为他。

时间已经过了半夜，红卫兵还在查抄、清点、欣赏得起劲。他们把我们一家四人都分隔在不同的房间里，怕我们串通一气，把财物隐藏起来；还盘问我们：有什么东西藏起来了。我暗暗好笑：我们的东西全都交了出来，你们再抄也找不出东西来了。但他们仍不相信，连枕头、被子都一件件摸过，当然一无结果。我的两个儿子都躺在椅子上睡着了，好像这个家已经不是我们的，随那班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吧。这样一想，我也有了睡意，竟然在灯火通明、人声嘈杂的房里坐在椅子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朦朦胧胧中，还听见看守我的女红卫兵在对别人说：“看她倒放心，还睡得着觉！”

我想，是你们做强盗、干坏事，来抄我们的家，抢我们的东西；我不做坏事，心不虚，有什么睡不着的！

天亮了，红卫兵们想要的东西都拿得差不多了。厂里的红卫兵把拿走的东西都开了清单，要我大儿子在清单上签字。当然，我们是无法核对拿走的跟清单上的是不是一致的，但有清单总比一笔糊涂账要“文明”得多。

早晨八点多钟，厂里开来两辆大卡车，装得满满的，满载而归了。本来，他们说还要把家具也车走的，特别是我们客堂里那套把地板都压沉的紫檀木古董家具，但是两辆卡车已经装满，他们懒得再开第二趟，说了一声：“下次再来拿！”就扬长而去了。

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存款和现金也全部一抄而空，我不知今后怎么生活，于是就问那红卫兵头头，能不能留一点生活费给我们。他们商量了一下，留下五百元，并说：“你们放心，

过三个月会解决的！”那时，我们当然不理解那“三个月会解决”的真实含义：是三个月后财产会还给我们，还是三个月后财产会正式没收呢？其实，我看，说这句话的头头也不会知道他自己这句话的可靠性有多大。但是，不管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想在当时，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然不是三个月而是会延续整整十年才解决！

厂里来的红卫兵走了，学校的红卫兵只能拿厂里红卫兵留下的“残羹剩饭”。他们来了几辆“黄鱼车”（上海把三轮货车叫做“黄鱼车”），在我丈夫的书房里拣了几千本书，再拿了些厂里看不上眼的财物，就也扬长而去了。当然，拿书时他们是不会漏掉那套“黄色”的、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的。至于去大批判还是大欣赏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两批红卫兵都走了。男佣老李倒按时来上班了。我丈夫站在楼梯口大声对他说：“我们已经一夜光了！一夜光了！你不用来了！”老李惊得目瞪口呆，进退不得，不知如何是好。我把老李请到楼下，对他说了昨夜抄家的经过，并说：“以后我们再也用不起佣人了。请你不用再来了。”

老李连连摇头叹息，说了几句安慰话，只好也走了。

这时，我们的整栋房子从上到下就像刚遭过战火的洗劫或强盗的抢劫，每一间房间的地上、桌上、床上、橱上都是东西；楼梯下一块十多平方米大小的方砖地上被红卫兵撕碎的书画竟有丈把高，差不多堆到二楼。有几间专门放箱子、杂物的房间给厂里红卫兵封了起来，不许我们动用。我们既没有力气打扫、整理，也不感到饿，只感到疲倦。

◇ 北京红卫兵来扫“四旧”，我被挂“大臭虫”牌子去扫街

中午草草吃了一点东西刚想休息，后门又“嘭嘭嘭”敲响起来。我儿子去一开门，来了一批不认识的红卫兵，说一口标准的北京话，都穿着解放军的黄军装，腰里还系着四指宽的大皮带，有男也有女。他们说是北京来的，到上海来扫“四旧”。我儿子对他们说：“昨天已有红卫兵来扫过了。你们不相信可到居民委员会去问。”

我们的意思当然是希望居民委员会为我们讲几句好话，至少为我们作个证，阻止北京红卫兵再来抄家。谁知过了几分钟，助纣为虐的居民委员会干部竟亲自带着这批北京红卫兵来了。

北京红卫兵没有见过上海的世面，一进门看见我们的房子就对我儿子说：“你们是上海最大的资本家吧！这栋房子应该开展览会。”

我儿子说：“上海大资本家多的是呢，我们根本算不上最大！”

他们楼上楼下一间间房又查抄了一遍。真正值钱的东西早就给前两批红卫兵拿光，大件的家具他们又无法搬走，只好把我儿子收集的几十本邮票簿的邮票都一张张揭下来，扔在地下；又把我丈夫几十年拍的照片都用几个大盒子装了，说要带到北京去开展览会，展览“资本家的腐朽生活方式”。他们还看见我家有很多五彩的塑料吹气动物，原来那是当时流行的玩具，我丈夫看见觉得颜色好看就买回来挂在房里，准备有小孩来送给他们做礼物的。红卫兵看见说：“老资本家还要玩玩具！”就拿了一个塑料鹦鹉，套在躺在床上的我丈夫头颈上！

在红卫兵进门前，我们早关照我丈夫躺在床上装作不会动弹的样子，所以北京红卫兵以为他已病得快死，倒没有怎么注意他，于是所有的怒气就都出在我身上了。在揭照片时，他们看见我结婚第二年跟丈夫游黄山时坐在轿子上拍的照片，对我大怒道：“你竟敢坐在轿子上，叫劳动人民抬你！你是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吸劳动人民的血汗！”

于是拿来一把剪刀，要剪我头发！我起初以为他们见我烫发，所以要剪去我烫的部分，不想他们竟乱七八糟地把我的头发都剪光了。然后，再在我的衬衣背后用毛笔写了“大臭虫”三个字，又写了一块“大臭虫”的牌子挂在我身上，给我一把扫帚，要我马上到路上去扫马路！

被红卫兵簇拥着走出家门，我看见我们隔壁的三叔公和三叔婆也剪了头发，拿了扫帚，挂了牌子，被几个红卫兵推着出来扫街了。再过一会儿，住在十号的孙家老奶奶也被剪了头发拥出来了，她的衣领上还插着一个大被拍。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那批北京红卫兵抄孙家时发现孙奶奶有一张拿着被拍子在拍被子上的灰尘的照片，于是说她：“臭要美！拍被子还要拍照！”当场剪了她的头发，插上被拍，挂上牌子，勒令扫街。孙家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时身体不错，但这样受了一次惊吓及侮辱，不久就去世了！

我们被红卫兵和围观的孩子们簇拥着在街上扫了一圈。小孩们还要我用手把垃圾放到垃圾桶里去，我只能忍着怒气照做了，心里想：我的头发给剪了，以后怎么上街？不明真相的人见了，总以为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怎么说得清呢？

扫了一圈地，回到家门口，红卫兵不让我们休息，叫我们分别站在自己家门口的凳子上，要批斗我们。这时，弄堂里已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红卫兵大声“揭发”我们的“罪行”，还要我的大儿子也揭发我们。我大儿子是做教师的，他事后对我说：“要我做戏有什么难！我才不会吃眼前亏呢。”于是他理直气壮地大声演说了一番，红卫兵也无话可说，只能就此下场了。我经过这些磨难已经难以支持了，站在凳子上竟不能自禁地发起抖来。

天早黑了，红卫兵临走，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我家门口，揭发我们的“罪行”，说我们一向吸人民血汗，现在从我家抄出了多少多少金银财宝云云。他们也没有忘了“解放”我们的女仆，还要我向女仆三鞠躬，并问我们的女仆要多少解散费。按照上海的规矩，一般解雇一个女仆是给一两个月的工资；但那时有红卫兵撑腰，她要三个月我们也只好给了，于是早上工厂红卫兵留下的五百元生活费一下子就去掉了六分之一！红卫兵还气势汹汹地勒令我：明天开始，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要挂上“大臭虫”的牌子去扫街！勒令我丈夫：挂在头颈上的塑料鹦鹉不许拿掉！明天他们要来检查！

他们走了。我累得坐在床上发呆。那时，我已经麻木不仁、呆若木鸡了。大儿子看见我这样，连忙过来对我说：“你要忍耐呀！千万不要想不开！就当做戏一样吧。”

但我想：以后怎么出门？怎么做人呢？！

◇ 破船上的四个鲁宾逊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脸也不洗，早饭也不吃，就挂上“大臭虫”的牌子去扫街了。看见隔壁的三叔公夫妇和十号的老太也出来了，大家默默无语。扫完地回去，见我丈夫早已躺在床上装死，头颈里的塑料鹦鹉当然没有忘了套上，而且鹦鹉嘴正对着他的鼻子呢！我看得真是哭笑不得！

我丈夫脖子上的鸚鵡就这么套了三天，除了吃饭、睡觉除下，平时就这么套着，以防红卫兵突然闯进来。然而北京红卫兵竟没有再来，他们一定去别的地方造反去了，早已忘了我们。但我的扫地却持续了几个月，因为那时我们已成“坏人”，任何人都可以勒令我们去扫街了！

自从北京红卫兵来抄家以后，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上门来骚扰我们。开始几天，每次红卫兵走了，素爱整洁的大儿子还要整理一下“战场”。后来，连他也厌烦了，红卫兵走了索性就让东西都横七竖八地堆在地上，要什么就在地上翻找。大儿子说，我们的房子像一条搁浅的船，而我们则像鲁滨逊一样，缺什么东西就去沉船上找！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坐着等到九、十点钟没有红卫兵上门来才去睡觉，早睡了怕听见敲门声要再起床开门。大儿子学校的红卫兵简直把我们家当做了仓库，缺什么就来拿什么。晚上来了就呆到半夜甚至第二天早晨。他们在楼下谈话、拿我们厨房的食品煮夜宵，有时还要我的两个儿子也去吃呢——因为他们也是革命群众。我们就在楼上睡觉，好象楼下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一样。他们走时常不锁门，我们也不起来关门，反正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偷；再说，即使防了小偷也防不了强盗，何必厚此薄彼呢？

小儿子学校的红卫兵也来了，抄去了厂里红卫兵留给我们的清单，说这是“变天账”，还把厂里红卫兵封着的房间打开，再查抄一遍。我和大儿子只能去厂里报告，以免他们以为是我们打开的。厂里说：“知道了。我们会通知你们居民委员会，让他们阻止别的红卫兵再来抄你们家。”

我以为这下子大概不会再有红卫兵来骚扰了。谁知当天下午就又来了一班延安中学红卫兵，把我们全家都赶到二楼一间房里，在其他房间又乱翻了一通，我们放在床前柜里的几十块钱和几百斤全国粮票也就不翼而飞了。他们走时，将上下十几间房全都封了起来，只留二楼一个卧室给我们四个人睡觉，底楼一间客堂给我们吃饭。我们的日常衣物都给他们封进了房间，天气日冷，怎么过日子呢？我们只好再去向厂里报告，希望他们来开封，但他们说：“红卫兵封的房间，我们不能动！”

我的两个儿子见他们都那么蛮不讲理，就动脑筋自己想办法。他们发现我们有的房间的门门外还有纱门，那是防蚊子用的，而红卫兵的封条就贴在纱门上。纱门的另一头是用螺丝和绞链连在门框上的。于是，我儿子就找来一把螺丝启子，把绞链拆下，把门从另一头打开，而这一头贴着的封条却可以原封不动，等进屋拿好东西再把门装上去，别人一点看不出我们已经开过门了！有的门，这批红卫兵来封了，另一批红卫兵打开再封，谁都弄不清楚是谁弄坏的封条，儿子们索性就小心地揭开封条进去拿东西，然后再封上，只要不把封条弄得太破就好了。

就这样，我们四个鲁滨逊在这条即将沉没的破船上住了两个月，直到“扫地出门”。在这六十多天之中，不知来了多少批红卫兵，房间的每个角落几乎都找遍了；有的房间，连地板都撬开来看，想找我们“藏”着的“财物”，可是，竟然没有一批红卫兵发现过我们起先藏过东西的那几个密室！我常常想：当时是否真应听儿子的话，把所有的东西都藏在里面呢？但是，如果真这样做，说不定我们全家都早就被红卫兵逼死了呢！再说，后来我们全家都被赶出了那栋房子，在别处住了十多年，那么即使东西还藏在密室里，又有什么用呢？

□ 摘自《山居杂忆》，高诵芬、徐家祯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

【劫后反思】

## 联动历史的断忆

• 林小仲 •

应同学之邀，我参加了2011年12月26日，在北京东郊京城梨园大戏楼餐厅，举行的《联合行动》45周年纪念会。参加聚会的有近二百多人，多数是文革中，北京海淀区各中学的老红卫兵及联动成员。

联动全称为：“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作为同龄人和亲历者，我也曾为他们在1966年12月贴出：“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而感到钦佩。但他们也大多是文革初期，“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对联的始作俑者和狂热吹捧者。当年首都中学红卫兵的许多风云人物出席，他们中有，卜大华、牛晓平、彭晓蒙、周春英、邹建平、马晓军、贺邯生等人。参加的学校有清华附中、师院附中、北大附中、石油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学校、47中、育英学校等学校。城区的四中、五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师大一附中等学校也有人参加。会场内大多按学校分桌，人少的几个学校一桌。还设了来宾席，多是当年大学红卫兵中的一些人士。师院附中有十几位同学出席。

会议由马晓军主持，舞台上悬挂着“《联合行动》45周年纪念会”，横着一面：“北大附中红旗小组”的战旗。会议先后有几位知名人士发言，没听出什么政治内容。倒是会场内唱歌、合影照相、相互碰杯交谈，热热闹闹，更像是一场老朋友的嘉年华聚会，只是少了当年穿着军装时“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风采。有些人安静的在座位上沉思，有的人相邻攀谈，有的同熟人致意问候，有的人还是那样张扬，似乎行走在水浒传的聚义厅里。

我中学时有幸参加过1966年12月26日大会。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为纪念毛泽东诞辰73周年，在北京展览馆集会，会议打出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旗号。进入会场，已感到火药味很浓。负责会议保卫的红卫兵如临大敌，在门口逐一审查。集会开始发言还正常，无非是向毛泽东表忠心之类的话。会议进行中，高高的剧场大厅飘落许多联动口号传单，一群红卫兵冲上主席台，抢过话筒大喊：“中央文革不要太狂了！”“造中央文革的反有理！”顿时，全场沸腾了。几千名身着各式军装的红卫兵欢呼着、雀跃着。几千顶军帽腾空而起，在空中盘旋。上百面红旗在大厅挥舞着、呼啸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那惊天动地的呼喊声，至今仍回荡在耳畔。

对于联合行动45周年纪念会本身，应该无可厚非，联动娃娃们曾为文革写下惊心动魄的一页。功也好，过也罢，那就是文革史或红卫兵史的一部分。况且会议组织者还刻意淡化政治。其实在民主社会，也大可不必，何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我想时至今日，即便与会的两百人，对联动历史的认识也未必相同，与其争论，不如开成这样一个高高兴兴聚餐见面会。这类会我参加过多次，我只想作为他们的同龄人，谈一谈我对联动历史的看法。

我们读了《联动事件始末》一文。感慨当年联动成员中的少数人，只截选1966年12月反中央文革。却忘了6、7月北京各中学红卫兵造反，矛头直指各校党委，是他们充当文革的开路先锋，将校园变劳改农场，使得学校领导、老师遭殃，同学打入成另类。忘了他们8、9、10月主导的红色恐怖，多少无辜生命被摧残。不知他们是否认知，老干部是人，平民百姓也是人，人不分贵贱，人的生命同样是宝贵的。联动们从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践踏人权，到1966年下半年，文革冲击老干部，危及自己利益，被迫举旗，反戈一击。联动中一些人文革中纳粹冲锋队的表现，多少人都记忆犹新。



多数中学生与联动之争，并非对文化革命和中央文革的评价，那时各派都迷信于伟大领袖，也没有几个人对伟大领袖发动、领导的文革发生怀疑。看看联动宣言和他们的号就知道了，将文革的责任全推给林和江两个集团岂非怪事。更何况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了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也好，造反派红卫兵也好，都是文革领导者的工具，利用之后便无情的抛弃。难怪几派红卫兵的头头，最后都被当做“5·16”审查。中学造反派与联动对抗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年多数中学生想求生存与平等的权利，而一些八旗子弟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像封建社会那样世袭江山，他们将其他同龄人变成奴隶或异类。但愿我的同龄人们回顾历史时都多点反思，不要再用文革思维评价文革发生的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封建血统论的对联，是老红卫兵和联动们的组织纲领，也是他们的思想基础。那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的思想，与封建王朝的世袭思想有何差别。难怪干部子弟中的绝大多数人，也都反对这一理论。我们讨论联动历史，不要忘记这些历史真相，联动们从北京天安门伟大领袖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红海洋，到穿着父辈军装，挥舞皮带闯入社会制造红色恐怖。从文革迫害扩大，老干部被揪斗，揪斗他人的红卫兵们，自己的父母也被揪斗，他们才被逼上梁山。难怪有人读完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回忆录后感慨，那些控诉别人整他们的人，为什么就不想一想当初，你是如何整别人的。

联动四十五年前，1966年12月26日，开始炮打中央文革，说明他们迷途知返，反戈一击。文革初期，正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紧跟中央文革，冲击校党委，反工作组，迫害老师和同学，为文革鸣锣开道，将法制和人权践踏在脚下，将国人中的所谓牛鬼蛇神置于皮鞭之下。他们的代表人物，曾被中央文革捧为小太阳，他们为中央文革迫害党内干部和知识分子冲锋陷阵，直到他们中很多人父母也受到文革迫害，他们才开始与中央文革反目，这是首都中学红卫兵中的联动骨干们的一段完整历史，历史不应该切割和截选，我们都还没有到对历史失忆的年龄。

我师院附中一位学兄，文革前学生党员，曾是我们学校红卫兵领军人物。他1966年8月18日上过天安门，后来，他带着对运动疑惑逍遥。他1968年去当兵，在部队曾被当做联动骨干和“5·16分子”受到近一年的审查。四十五年前的12·26大会，他也参加了，北京展览馆会场场租费都是他们从师院附中借来支付的，师院附中红卫兵还执行了大会外围保卫工作。他参加联动四十五年的纪念会后谈了两点想法：一是在联合行动45年纪念日时，联动骨干到底有何诉求？看不出来。时至今日，一部分人还不加节制的自恋，自以为居功至伟，使他费解。二是仍抱着文革的种种派性和观点，论道历史，点评众人，实在可悲。

我们这一代人曾深受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思维影响。也曾相信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的所谓立场逻辑。其实世界不是这样的，联动既不必被妖魔化，也不该被神化。那时候，都是中学生，一群冲动的孩子。我们希望能真实、公正评价联动的历史。联动骨干们出自老红卫兵中的部分积极分子，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联动中少数人时至今日对自己历史的评价，与历史真相差距太远。

团中央主管的2012年第一期《中国青年史辑刊》有一篇访原北京团市委副书记汪家镠的文章，汪家镠文革后曾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她回忆文革时说：“挨过多少次斗我记不清了，但1966年8月19日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会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晚上，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和北京团市委、北京市教育局的干部在中山音乐堂召开批斗‘黑帮分子’的大会。我和市委教育部部长张文松、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市教育局原局长孙国梁、副局长韩作黎、西城区委教育部负责人侯维成、杨荣梅、原八中校长温寒江、四中校长杨滨、六中校长朱吟宜等人一起被押到会场。只见台下带着红卫兵袖章的革命小将黑

压压一片，群情激奋，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我感到这次的批斗可谓声势浩大。没容我多想，立刻有人把事先准备好的写有‘黑帮分子’的大牌子挂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两名威风凛凛的红卫兵也迅速站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身后。我听到了那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坚决打倒黑帮头子张文松！’我们被身后的红卫兵押着面对观众低头弯腰，做‘喷气式’。这时观众席里忽然传出整齐一致的呼喊：‘跪下！跪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膝弯处就被站在身后的红卫兵狠狠地踢了一下。

批斗大会进行中，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腰间的军用皮带，没头没脸地向我们这些‘黑帮分子’打来，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押送他的红卫兵把他带到后台，用凉水冲洗一下，就又押回前台，孙国梁被打断了几根肋骨。我被押回时在车上一个红卫兵问我：‘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我大声地争辩，我话音还没落就被一脚踢下车，晕了过去，好长时间才缓过来。这次中山音乐堂的批斗会开了武斗的先例。”（摘自《中国青年史辑刊》）

汪家镠是建国初期的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她的爱人王泚是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她们都曾在北京团市委工作。王泚还曾是我的母校师院附中的副校长。文革开始，他们夫妻都遭受残酷迫害，他们的儿子当时只有7岁，由外公、外婆带回上海，度过没有父母相伴的童年。汪家镠书记的回忆对于某些当年的老红卫兵，或者他们中的联动成员反思文革或许能有几分帮助。

对于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北京四中的各派精英出版了《暴风雨的记忆》，他们从各自立场角度回顾文革。他们中有北岛、曹一凡、秦晓、杨百朋、陈凯歌、刘东、唐晓峰、冯永光等人。其中刘辉宣的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往事，让人看到反思者的勇敢和正直。北京师大女附中历史悠久，声名赫赫，1966年8月5日，校领导卞仲耘被自己一群女学生活活打死，成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个罹难的校长。为了彰显她献身教育事业的忠诚和仁爱，并寄托学生们的缅怀与反思，为了记录历史，抢救记忆，也为了对民族，对后代，对自己的良心有一个交代，师大女附中500位校友捐款制作了卞校长铜像，并于2011年5月7日举行了卞仲耘校长铜像揭幕仪式。

回忆文革，虚构一贯正确的大有人在，他们还在梦里自我陶醉。当年的首都中学红卫兵里，何止老红卫兵和联动中人梦回吹角连营。四四派几位头面人物在知情人尚健在时，就堂而皇之的编撰故事，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四三派的个别当年领军人物也步其后尘，移花接木，续写虚拟的英雄史。我更亲眼见识过有人在同学聚会席间，故作领袖状自吹自擂，对文革个人表现侃侃而谈，仿佛在文革中指挥过伟大战役一般。有位原本是文革派系中不三不四之辈，公然编造12·26登台与联动辩论等天方夜谭，所有参会者都知道，那天是老红卫兵独家会议，上台发表不同意见的，只有八中红卫兵计三猛，若不是西纠的兄弟们拼命保护，他也遭到围攻，险些挨打，何来其他人上台辩论。我想这些现象不单是某些个人的悲哀，更是我们一代人，受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理论，受形而上学唯我独尊的影响，缺少反思，缺少包容，缺少对人性的理解的先天不足，所造成的人格缺陷。

1978年，叶剑英元帅在一次讲话中说，文革使中国一亿多人受到迫害。对于文革的事要历史地去看，那是一个没有法治的黑暗年代，那是一个封建皇权思想泛滥的年代。文革的责任在于他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而不应当由当时只有十多岁的首都各派中学红卫兵负责。问题是做为当年红卫兵一代回顾历史时，要有必要的反思和忏悔。显而易见，不管你当年属于哪一派，文革中那些残暴的打人凶手，那些将学校领导老师送进劳改队的组织者，那些在社会上胡作非为抄家夺命的暴徒，那些借运动落井下石，陷害别人的政客，一生何能安心？北京的中学红卫兵运动中有过这样的人，他（她）们终生不得安宁，这也应该是一种报应。

在文革当中，我们曾分属不同红卫兵组织，事过多年我早已将当年派别成见烟消云散。想想腐朽的满清王朝后期，一些八旗子弟，自恃血统高贵，已经沦落到提笼架鸟了，还招摇过市，颐指气使，不忘祖辈上马背上的功德。其实，即使文革初期，许多被打入另类的同学的父辈们，也为共和国的创立，为国家民族做过贡献。即便是普通人，或者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人也是平等的，也有平等的生存权利。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的年代，将天真烂漫的中学生，变成势不两立。用简单的红与黑，对与错解释历史，不仅站不住脚，对己对人，都无益处。如果说文革初期，扮演冲锋队角色的联动们，是因后来父母遭迫害，被中央文革逼上梁山。那么，1966年底，异军突起的中学造反派红卫兵们，也是因为遭受文革迫害，为了生存的权利，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当然，他们也和老红卫兵们一样，难免成为推进文革被利用的对象。

我想这些简单想法，应该获得包括参加联动纪念会在内的绝大多数同龄人的认可。即便有不同意见，也是各自的历史话语权。

我们这一代人，有人称红卫兵一代，有人称老三届一代，有人称知青一代。我们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的一代，我们经历了新中国初创的暴风骤雨年代，我们经历过苦难与辉煌，我们经历过挫折与希望。我们全过程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一千七百万人漫长的上山下乡，经历了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我们有责任将文革历史的真相告诉后人，让十年浩劫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者林小仲，男，共和国同龄人。文革时就读于北京师院附中，上世纪七十年代下乡呼伦贝尔（当时划归黑龙江）近十年知青岁月。）

□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梦随风万里》）

附：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天下大事，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实施必要的行动。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势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它，威胁着我们！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先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党中央为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1966年12月5日

~~~~~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六）

• 王复兴 •

（上接 z k 1 7 0 1 d，第五章 1 9 6 7 年北大再次大乱）

1 8、“红梅”战斗队坚持批极左、反极左

7 月时，“红梅”战斗队认为斗争大方向是批极左、反极左，而不是反右。“红梅”战斗队基于当时的思想状态，干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红梅”起草并贴出了一份质量较高的长篇大字报《评反革命极左思潮》。这是由王渊涛、陈双基、俞政和我 4 人合写。大字报的中心思想是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极左思潮，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破坏一切的错误倾向。当前应反左，不是反右。指出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点名批判了吴传启，指出他本来就是国民党，有党员证。指出吴传启及其后台在推行一条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报左路线，革命派要奋起与这条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大字报指出吴传启有后台，影射了林杰、关、关锋。这篇大字报是个重型炮弹，影响很大。

还有一件事是：当时“红梅”了解到中央文革有个调查员叫张超，是个女的，40 岁左右，以《红旗》杂志记者名义长驻北大，公开支持“红旗飘”、牛辉林。6 月 5 日以后，她一天到晚往“飘”、“零”那里跑，经常参加“井、红、团、零、飘”的串联会、队长会。专门为林杰、王、关、戚提供不利于“新北大公社”的材料。她时常散布不利于校文革的消息和言论。6 月 1 2 日在 4 3 楼 2 3 2 室，在物理系“革造团”队长会议上，有些人批评“团”派总部对聂斗争“右倾”。张超参加了会，并给会议主持人写了纸条：“你们的会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写出个座谈纪要来。”了解到张超这些活动，我们“红梅”开会商量，需要教训她一下，让她不能乱汇报，净抹黑；不能支一派、打一派。于是我去找了张超，说有情况向她汇报，请她到 3 8 楼我们宿舍去谈谈。到了我们 3 8 楼 3 1 3 室后，“红梅”七个人围着她，对她讲了北大形势，警告她不得乱汇报，不得支一派打一派，教训了她一通。当时来这么一下子，也有“敲山震虎”的意思，向张超的“上面”传递一个信息，你们要搞什么阴谋，我们盯着呢，“新北大公社”不是好惹的。此事聂元梓根本不知道，是我们“红梅”几个人胆大包天干的。

8 月 2 日，中央文革关锋在人大会议堂召见聂元梓，对聂说：“你们围攻记者是错误的。你要向记者道歉。难道你不知道，张超不是《红旗》的，是中央文革派的吗？”

8 月 3 日，“井冈山”广播台广播：“不许聂元梓围攻张超同志！”“聂元梓必须向张超同志道歉！”同一天“井冈山”贴出大标语：“不许聂元梓围攻张超同志！”？

1 9、文攻“作战部”做的几件事

8 月时，负责文攻任务的“作战部”成立了下属的写作组，取名“新北大人”，由我负责，成员有：张绍清、陈双基、曾镇南、扬子浪、王渊涛、俞政。主要的“笔杆子”是三个人：曾镇南（中文系二年级）、扬子浪（原名谢定国、数力系四年级）、张绍清（历史系四年级）。曾经以“新北大人”笔名贴出过一些质量较高的长篇大字报，有批评“井冈山”要“砸烂校文革”是方向性错误的文章；有批判左思潮、反吴传启的文章；有呼吁两派停止内战，主张大联合的文章，等等。

大约在 10 月底，索世晖和我商量，他提议由“作战部”组织、成立一个大型的文艺宣传队，取名叫“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团”并由任瑚琏任“胜利团”团长。我和任瑚琏都觉得

他这个主意很好，天天打派仗，人们都觉得挺没意思，人心涣散，搞些大型文艺活动可振奋、聚合人心，给枯燥的生活添些乐趣。“公社”不乏大批文艺人才。任瑚琏很快拉起队伍，并举行了成立大会。我参加了成立会。会上索世晖、任瑚琏做了讲话。

“胜利团”的艺术骨干编写并排演了毛主席诗词联唱：“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后来又编写、排演了大型歌舞剧“抗大之歌”。该剧排的挺成功，观众都感觉艺术水准挺高。这是个集演唱、舞蹈、话剧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大型歌舞剧。黄虹坚是演出队员之一、舞蹈队的领舞，她的动作收放自如，有股韵味，我挺欣赏，不知她什么时候练成的。每场的转换都由司仪出来朗诵诗歌作为下一场的“引子”，司仪兼领诵人是中文系的郭瑞，他身高马大，穿着八路军军服，往台角一站，高声朗诵，中气十足，吐字铿锵。扬子浪评道：“郭瑞很有气派！”歌舞剧的舞台背景与灯光挺讲究，延安宝塔山的布景挺漂亮。“胜利团”每次演出节目挺多，如：毛主席诗词连唱、还有小节目：对口词、小品、舞蹈等。“钢琴伴唱红灯记”也很受欢迎。担任“铁梅”演唱的张敏（外语系英2学生），每次演唱完都要谢幕多次并加演。人们评论张敏的旦角唱腔达到专业水准。张敏后来成为我的夫人，她从小就喜欢国粹京剧，而且旦角唱腔的嗓子是天生的，没有经过什么专业训练，只是在文革前，在北京剧队玩过二年。后来“井冈山”也学“公社”，成立了大型文艺宣传队“万岁纵”。两派的“胜利团”或“万岁纵”演出时，两派群众都不分彼此，踊跃观看。对大联合有点促进作用。“胜利团”还应北京各高校、工厂、机关、部队之邀，频频出去演出，很受欢迎。那时没有电视，也没什么电影，只有八个样板戏，文学艺术领域如一片荒漠。“胜利团”的每次演出，对那时的人们来说，是个难得的精神盛宴。

20、外出串联，登泰山，临曲阜

8月上旬，我和马西沙及两个“井冈山”的朋友“搭伴”，4人外出串联，实为游山玩水。先去泰山，登上“南天门”，到达峰顶，心旷神怡，极目鲁天舒。在山顶过夜，第二天一大早观日出，而后下山。第二站去了曲阜。进了孔庙，惨不忍睹，墓碑、华表、石龟等雕塑已被北师大“井冈山”当地造反派砸的七零八落。北师大谭厚兰在戚本禹、林杰授意下，于1966年11月，带领北师大“井冈山”200多人，来曲阜造反，与当地造反派一起把孔庙、孔墓；孔府、孔林都砸了，破坏严重。我们看到孔庙被砸成这个样子，已无心情去孔府、孔林。离开曲阜，我一个人先行回了北大。马西沙三人南下去了江南游览。我此次出游，仅用了七、八天。8月中，我一回到北大38楼，就听王渊涛对我讲，全国反军浪潮很猛烈。8月9日“井冈山”在38楼前集会，牛辉林有个反军演说，说全国各地造反派正和军内走资派做殊死搏斗，“新北大公社”是“老保”，支持各地保守派。王渊涛说“公社”现在很被动。我们俩人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的想法是，坚决顶住，静观其变。

21、牛辉林的“8·9演讲”

王渊涛所指牛辉林的反军演说，发生在1967年8月9日，在北大38楼前“井冈山”集会，牛辉林做形势报告。他这个演说的背景，正是在武汉“7·20事件”及《红旗》发表“八一”社论之后，全国掀起“揪军一小撮走资派”的高潮。《红旗》的“八一”社论讲“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后来得知，这个社论是由林杰、关锋、王力起草、发表。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动员令。）

牛辉林在这个演说中，分析全国的形势，极力夸大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严重、尖锐，举了很多全国各地军队镇压群众和造反派冲击军区、军队的事例。号召“井冈山”再次开始新的大串联，到全国各地去反军内走资派”。下面是他演说的摘要（据油印传单记录稿）：

“66年二月兵变确有其事，李井泉警卫员已经揭发。他们曾经决定将兵变转到67年2月，所以有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军内走资派是二月黑风制造者。”“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说：根据陈再道过去的表现，知道他会暴乱。”“徐向前、叶剑英、陈毅在颐和园开秘密会议，陈毅秘书揭发的，说‘7·15’全国大乱。”“从此可以看出是党内军内一小撮在密谋策划。”“通过几个月的支左运动完全暴露了军内走资派。”“军内问题解决之后会出现一个大转变。可以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造反派队伍。”“新北大公社在外面，支左还是支保？”“聂元梓公开支持‘保’字号组织，简直不能容忍。”“38军是坚决支左的。（暗示38军支持北大“井冈山”，聂反38军。）”“聂孙他们在校内外挑起武斗，企图在全市挑起更大规模武斗，炮打谢富治，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新北大公社是聂孙的御用工具。”说北大井冈山“已走了1300人，我们在各地基本上有人了。”

以上是“牛辉林8·9演说”的摘录，占他全篇演说的五分之一的内容。那时就真有脑袋这么发热的。他在报告里，小道消息猛忽悠。他的这个“演说”有几点值得注意：他紧跟《红旗》社论，明确提出“军内一小撮”、“军内走资派”；点了三个老师名字：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表示“井冈山”已有1300人到全国各地反军；攻击聂元梓、“新北大公社”支持保守派；重提陈伯达“6·5”讲话，说聂“炮打谢富治”，“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

三天之后，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8月12日，“井冈山”总部勤务员牛辉林在校内又“作形势报告”，说“全国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要“揪军内一小撮。”

牛辉林当时在北大，迎合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思潮？历史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对于牛辉林而言，这当然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上了《红旗》的当。

“新北大公社”没有参与各地的反军活动。当时有谣传说聂元梓、“新北大公社”反38军，牛辉林也造这种舆论。为此，聂元梓专门派了卢平和赵建文二人专程去保定拜访了38军军部，进行辟谣，与38军首长座谈极好。（注10）此事最有力的证据是，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毛泽东对聂元梓讲“你们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你们访问38军这事做的好。”这是有案可查的权威性的历史证据。聂元梓文革后提起此事说，“今天看来，我们拥军和反谢，都是正确的。”（抛开“成王败寇”的陈腐历史观，探究历史的真相，聂元梓这句话是符合事实的。）

22、王、关、戚垮台

1967年8月，在那个炎热的盛夏，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外交代办处的事件，全国阶级斗争的温度也达到了顶点，各地“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军浪潮高涨，到处发生抢枪事件和大规模武斗，运动严重失控。毛泽东为稳住军队，握牢军权，抛出了王力、关锋做替罪羊。毛泽东针对“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批示“还我长城”。并指示杨成武回京转告周恩来关押、审查王力、关锋。对戚本禹暂时没动。

8月26日，周恩来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揭批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是“毁我长城”，反军乱军，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会议还批判了王力的“8·7讲话”是企图打倒陈毅，在外交部夺权。会议决定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8月27日，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军队冲派的对立面）抄了林杰在《红旗》杂志的办公室。《红旗》杂志小车班的人把这消息告诉了北大，好消息马上在“新北大公社”内传开。

9月1日，周恩来、江青、中央文革在出席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时，王力、关锋没有出席，大家明白王、关倒了。江青在会上不点名地批判了王力、关锋。江青发言时，不同于以前，多次强调要批极左，反极左。江青说“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捣乱，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他们‘反总理’，‘到处揪军内一小撮’，‘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江青这些话是指谁？当时红卫兵的头头们都明白。

9月，北京两派斗争形势骤变，“学部红卫兵联队”、潘梓年、吴传启迅即跨台，吴传启逃跑，不久被北京卫戍区抓捕。周景芳（戚本禹安插在北京市革委会的秘书长）及潘梓年、林聿时、洪涛、刘郢、王恩宇都被北京卫戍区收监。

那时北大校园内的气氛是，“新北大公社”的人个个兴高彩烈。我们原“66”的一帮人到海淀下了好几次“馆子”，聚餐，“改善”，喝啤酒，高兴。相反，“北大井冈山”的个个垂头丧气，不高兴。当时，聂元梓及“公社”总部三令五申，不许“公社”群众游行、欢呼、贴大标语庆祝。“学部总队”（学部反吴传启一派）到北大贴了大标语“新北大是坚定革命派！”“坚决支持新北大公社的一切革命行动！”

据校友胡宗式回忆，1967年9月中旬时，他在校园遇见“井冈山”头头候汉青，候汉青对他说“我们保王、关，是保错了。”胡宗式对此评道：“这才是北大人的科学态度和胸怀。”

1967年底，我在家里对哥哥王复东说，“王力、关锋倒了，下一个是戚本禹。”他吓了一跳，对家里人说，“复兴反中央文革的戚本禹。”为我担心。没过多久，1968年初，戚本禹也垮了，被抓捕、收监。

23、关于反左、反右之争

下面，是我对1967年1月至9月，北大两种思潮斗争的反思：

那时“新北大公社”的骨干成员与聂元梓、孙蓬一的观点一致，认为当时从上至下的主要错误倾向是极左。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吴传启、林杰以及他们的后台（聂、孙已认定后台就是王、关、戚和谢富治）。北大“井冈山”的个别头头是受了极左思潮影响。（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于避免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毛泽东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而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则是当时人民群众的普遍心理常态。“井冈山”的个别头头是无辜的革命群众，他们属于认识问题。）必须正视的是，从1967年1月至9月，在全国、在北京、在北大，从上至下，曾经存在过反左与反右之争。而先知先觉者抵制极左路线，反极左思潮是历史的进步因素，具有重大意义。

反左与反右，何谓左？何谓右？左与右是指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态度分野。对阶级斗争采取激进态度是左，采取保守态度的是右。当时无论反左或反右的两派群众都不可能否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是政治正确。“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条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是于1962年党的八届10中全会上，由中央全会确定的路线。文化大革命是贯彻毛泽东阶级斗争路线的大实践，也是人为地推动阶级斗争到达极端的阶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都跳不出这个基本路线的框架，但仍有激进和保守的

区别，有紧跟与抵制的区别。1967年，以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为代表的一派，抵制了极左路线，冒着极大风险，以进攻态势，反极左思潮，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反谢富治。这是历史事实。当时这一派人虽还认识不到毛泽东是极左路线、极左思潮、极左人物的总后台，但已达到自觉反对极左代表人物王、关、戚、谢富治的高度。而当时中央的这些人正是文革中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客观上，新北大不自觉地抵制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新北大反极左的斗争是北大文革史，也是整个文革史的一个亮点，它脱离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宗旨，它的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它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党、政中的“走资派”，而是指向了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它不是反右，而是反左；它是属于“人民文革”的范畴。迄今为止，人们受制于官方的定调及曾经的对聂元梓的非法的不公正的判刑之制约，没有能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

文革中清华的“414派”及“414”思潮也属于偏保守的倾向，但“414”主要是在学校范围内主张解放、依靠大部分干部，并认为“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意即清华造反派（团派）不能在清华掌权“坐江山”。把“老四”这个观点深入推理下去，岂不是在中央的文革暴发户中央文革，也是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吗？难怪毛泽东对“414思潮”反感。“414”的核心成员曾公开贴出反陈伯达的大字报。清华“414”与新北大公社的倾向相近，当时都被视为偏右、保守。但不同点是，新北大派对极左的代表人物采取了进攻的态势，形成了群众运动，这是人民群众在文革不断觉醒的过程中，走的更早、更快、更向前的一个群体。

下面有一个事例，有力地证明了聂元梓、“新北大公社”是坚决反对极左路线的。1968年3月24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人大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首都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列席，北大聂元梓、马云龙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上，林彪宣布毛主席决定打倒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江青在此次大会讲话中，说王、关、戚是形左实右，他们是被中央文革端出来的，有人想借王、关、戚倒台搞右倾翻案，右倾翻案是当前主要危险。（笔者认为：江青担心王、关、戚倒台后，如进一步反左，会反到她和中央文革的头上。）江青批评聂元梓，“我要你反右，你偏反左。”会后，关于大会的内容，马云龙在北大广播台向全校做了传达。

我于2015年4月，在北京向校友马云龙核实江青在“3·24大会”上讲的这句“我要你反右，你偏反左”，马云龙肯定地说，“我在笔记本上做的记录，回校也是我传达的，肯定有这句话。”校友索世晖、扬子浪也都记得这件事，肯定江青是这样讲的，马云龙传达的。

3月27日，中央文革在首都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林彪出席，公开打倒杨、余、傅，称杨、余、傅是“变色龙、小爬虫”。江青在大会讲话中，再次批评聂元梓“反左”是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在这次10万人大会之前，3月8日凌晨，陈伯达、江青接见聂元梓，对她讲“你要反右，不要反左。”据“公社”动态组负责人胡宗式对我讲，当时江青对聂讲得最重的话是：“你们为什么抓住王关戚的问题不放呢？王关戚后面还有大的吗？刘少奇吗？”（王关戚当然和刘少奇扯不上。江显然是话里有话。）江青在那段时间，接二连三敲打聂，训斥她不可反左。对反左很紧张。我记得那时“新北大”写作组开会时，商讨写一篇系统批判王关戚极左路线的大字报，讨论时中文系曾镇南说：“我们批王关戚，江青肯定不高兴。”曾镇南的直觉和判断很准确。戚本禹在其《回忆录》中说，1967年8月26日，周恩来在中央文革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指示，宣布王力、关锋因反军乱军、“毁我长城”，进行“请

假检讨”，实为“隔离审查”。戚本禹把王、关送到钓鱼台二号楼软禁后回到会场，这时周恩来已离开。戚本禹看到：“江青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了，哭得很伤心。”（注11）

而聂元梓却在那段时间，在北大俄文楼的一个小范围会议上讲：“中央文革提中央文革的口号，我们提我们的口号。当前不是右，而是左。我们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是要反左。”

在杨余傅倒台之前的1968年初冬季，我也曾直接卷入左右之争。在一次中央文革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时，江青发言时强调“王关戚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其实质是极右。”当时在场的中央文革成员及谢富治、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叶群、温玉成等大员，非常奇怪地一个一个强烈表态：轮流发言，表示同意江青讲话，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捍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等等。北大传达了这次会见及江青讲话后，我连夜组织“新北大”写作组写了一篇大字报《反左防右》，题目是我定的，中心思想是：极左是主要危险，目前主要任务是继续批判极左思潮，肃清王关戚的影响。但同时要防右，防止右倾机会主义抬头、反扑。这张大字报是与江青讲话“拧着”、“顶着”，坚持反极左，但提出“防右”是为了不明显地违抗江青讲话，对其讲话做出自己的“解释”。大字报贴出后，“公社”有人贴出《王关戚是形左实右》的大字报相呼应。“井冈山”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新北大”曲解江青讲话，当前应反极右。当时出现了许多两派关于反左反右的大字报，形成了一场左右之争的论战。过了一、二天，李文告诉我，聂元梓对他讲，“新北大”的大字报写的不错，“这批人挺有头脑。”表示赞赏。文革中反极左还是反极右之争，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级上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

1973年春，我在河北安国县中学高中任教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开展大批判，我写批判林彪的文章就是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批判林彪对党政干部打倒一大片的罪行。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国家真是折腾的够呛了。自己从北大毕业，被贬到农村教中学来了。不满情绪在增长。主观上认为，文革已到后期，应借批林，肃清极左路线影响，尽快实现安定团结，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结束文革。当时思想上还认识不到应否定文革，也认识不到毛泽东是极左路线的总代表，但对批极左路线十分执着。没料到的是，不久传达中央文件，毛泽东批评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批判他批林要批极左是错误。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让周恩来管《人民日报》。1972年8月1日，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批林要批极左路线，但遭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对。王若水坚持按周恩来的指示批极左，在10月14日《人民日报》上用整版发了三篇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结果遭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严厉批评。王若水不服，于12月5日上书毛泽东，提出《人民日报》批林整风应批极左，表示拥护周恩来关于批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姚不同意批极左的问题。1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了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说“批极左还是批极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右的不能再右了。”随后，王若水在《人民日报》遭到批判，被撤职，发配到大兴红星公社劳改。在此次王若水批极左的事件中，毛泽东在反左反右之争中，从幕后走到了前台，而且名为批王若水，实为批周恩来。当时我明白了一件事：反对批极左的总根子是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引起了思索。

综上所述，今天看来，反左反右之争始终贯穿了文革的全过程，而且从中央到基层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激烈斗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就是一条开展极端的阶级斗争这样一条极左路线。反之，从中央到地方也始终存在着对其进行抵制的力量，存在着批判极左思潮的进步潮流。

文革中的反左反右之争，直到毛泽东去世，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有了基本结论。据郭道晖着《四千老干部民主评议党史》记载：1980年10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之后，曾召开4000多名高级干部进行大讨论，征求意见。实际参加此次大会的有5600多人。这次会议比较民主，与会者大多是劫后余生的老干部，他们体验深刻，畅所欲言。关于毛泽东的错误，大多数干部的主流意见是：毛泽东自1949年建国以后至文化大革命，制订并推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许多参与讨论者，反对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分开论述；反对说文革前17年没有错误路线；反对把毛泽东与“四人帮”区别开来。强调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总代表。但大部分高干（包括陆定一）的正确意见，却不被邓小平、陈云接受。邓小平10月25日对“决议”起草组的负责人胡乔木、邓立群讲：“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重大错误。”多数人的正确意见未能写入“决议”。但主流共识存在，它是大多数人的认识。邓、陈为维护党的形象，维护毛泽东遗留的党国体制，并掩盖自己在十七年协助毛泽东制订、推行极左路线的“助纣为虐”的错误，否定了大多数人的正确意见。但在1981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会制订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实际否定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而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在4000人大会对解放思想起了极大推动作用的“理论务虚会”后期，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原则，是以阶级社会、阶级斗争为前提的，要坚持以中共的专政手段解决阶级矛盾。于是，邓小平搞了一个折衷主义，提出两个基本点：一个“改革开放”，一个“四项基本原则”，二者平行，为“改革开放”留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尾巴，并为坚持一党专政提供了依据。邓小平管那叫“两手硬”。于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每隔几年便会出现一次左的阶级斗争的干扰，如“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罢免对改革开放有重大贡献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直至“六四”镇压开枪，镇压法轮功，这都是在“四个坚持”旗号下进行的极左干扰和罪错。

以上论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发生的反左反右之争。在这个大历史的背景下，回过头来审视1967年在北京、在北大，左、右两种思潮的斗争，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反极左思潮，反吴传启、林杰，反王关戚，反谢富治的斗争，其历史意义应是很明晰的，无容质疑的。觉醒有个过程，反极左无疑是向着完全觉醒的方向前进。反极左是个正确方向。当年聂元梓、孙蓬一领导的校文革及“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其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斗争矛头不是指向老干部中的“走资派”，而是指向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不是反右，而是反左。它属于人民的文革。它实际上是抵制了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但并不自觉，主观上认为是在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聂、孙及“公社”在当时（1967年）并不是政治完全正确，无论是北大的“公社”还是“井冈山”，无论是北京的天派还是地派，当时在“拥毛”、拥护文化大革命，反对刘邓路线这个最大政治问题上是一致的，都是政治不正确。两派都拥护文革，都被毛泽东所利用。

24、骑车去北戴河

1967年9月中，王、关倒台后，我高兴且轻松，想累累身体，放松一下精神，出去玩玩。我和马西沙、陈双基决定骑车远征北戴河，拥抱大自然，到大海里游泳。于是每人带上水、地图，骑着自行车，向东北方向急驶而去。北京到北戴河有400多公里。一路上芳草萋萋、鸟语花香、树影婆娑。我们或走公路，或穿小路，日行12小时。晚上借着月光狂奔，两侧树影呼呼向后退去，幸亏没撞上大树，否则非伤既残。中途在小旅店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傍晚到达北戴河大海边。一路上口干舌燥，吃不下饭，净吃西瓜和桃了。到了海边，

松了口气，看到涛涛大海，那个畅快！改善伙食吧，每人来了一份三鲜饺子，美味之极，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美食？到那里住？旅馆太贵。三人一合计，走吧，去秦皇岛，找个澡堂子准便宜。一打听，要走20多公里，小菜一碟。于是沿着海堤马路，一个多小时抵达，找到个澡堂子，安营扎寨。一躺下来，全身散架，昏然入睡。第二天吃过早餐，骑回北戴河。找到一个海滨浴场，沙滩开阔，白砂细软，没个人影。于是三人来了个天体浴，冲入大海，随波畅泳，上岸后大字形仰天躺下，享受日光。傍晚返回秦皇岛。如此三日。第4天起个大早，踏上返程。我一马当先，劈风前进，二人紧跟。走了很多山间小路，天黑来到源河大桥。到了大桥，三人傻眼，大桥入口，铁门紧闭，入夜封桥，卫兵把守。怎么办？回头吧，荒山野岭，天色已暗，筋疲力尽。莫非要在野地里睡一宿等天亮？情急之下，紧急相商，计上心来。“卫兵同志，我们是北大的红卫兵，中央文革有紧急任务给我们，要赶夜路，请放行。”卫兵不敢做主，电话报告县委书记。县委书记急急赶来，一听，立马下令“马上打开铁门放行！瞧瞧人家红卫兵的革命精神，你们要好好向红卫兵学习啊。”于是过了桥，顶着月光骑了十几里。找到一个大车店，有股刺鼻子的马粪味。顾不得了，凑合吧。过了一夜，第二天上路，曾错走了一段废路，只好折回，找对道路再走。下午骑到通县，都骑不动了，两腿如同灌了铅，沉重之极，只好推车步行。看到个卖大碗茶的，还是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凑钱，三人一摸口袋，总共凑了三分钱。卖茶的说一分钱一碗，你们有三分，只能喝三碗。于是每人大口灌下一碗。再推车前行。正好后面来了辆军用卡车，忙举手拦下，我说“解放军同志，他病了（指指马西沙），骑不了车，劳驾，能搭个顺风车吗？”“去那儿？”“天安门。”“顺路，上车吧。”我们赶紧把自行车搬上了卡车，很快到了天安门。下了车，再三谢过司机，各自回家。这趟自行车远征，真够累的，可挺痛快。

2 5、厌倦派性斗争，力争两派联合

1967年10月至12月期间，“公社”负责文攻任务的“作战部”的一批人，对北大无休止的派斗，越来越厌倦，觉得这样下去，看不到运动的前途和出路。在10、11、12这三个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群众组织的派性、无政府主义，宣传大联合、三结合、解放干部、制止武斗，进行斗、批、改。负责文攻任务的“作战部”成员很注意学习中央党报、党刊的这些指导性的文章，经常讨论，寻找运动的出路。头脑日益清醒并主张停止派斗，实现大联合。

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编辑部社论”，号召学习、执行“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社论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当时我们反复讨论，觉得毛主席的指示非常符合北大的实际。北大两派师生，那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本来都同在北大生活、学习，又共同响应中央号召投入运动，现在仅仅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就相互把对方视为“敌对阶级”。本应相互尊重，却相互仇视；本应平等相处，却要压倒对方；本应相互合作，却要残酷斗争。这本来是很明白的道理，但两派群众的大脑都被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观念搞乱了。“66”早在6月11日“起风雷”的大字报中就曾批评孙蓬一“用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来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表现出“‘左’的可爱”，进而“打击不同意见。”其实“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打击不同意见”，两派同样存在，但人家的缺点错误应由人家自己讲。“66”核心成员到了10月更坚定了“反对夸大阶级斗争严重性”的立场和认识，但受历史条件局限，还认识不到应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

10月7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号召认真学习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指出，要实现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要告诉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是他们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作战部认真学习、讨论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识到要实现与“井冈山”的联合，有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是必须承认对方是“革命群众组织”，这在当时“公社”内部很难被大多数人接受。即使“井冈山”的个别头头跟着王、关、戚跑了，那也是“受蒙蔽”，“不能压”，一“压”就没法联合。第二是必须多做自我批评，批评本派的缺点、错误。这是促进联合，双方走到一起的唯一途径。一味指责对方，还是“打内战”，八百年也坐不到一块儿。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逐渐把批评的重点指向了校文革打“内战”的强硬派孙蓬一。以至于到了68年初，我们被“公社”内部许多人指责为“策略派”、“机派”。所谓“策略派”是指一味讲究“策略”，缺乏斗争性。这是好听的说法。难听的说法是所谓的“机派”，“机”是指“右倾机会主义”的“机”字。指责我们放弃了对“井冈山”的路线斗争，“右倾”。但我们认为正如毛主席所说“现在是他们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不仅是“可能”，而是孙派正在犯错误。他们是另一种形式的极左思潮，夸大阶级斗争，以极左态度对待对立面群众。记得当时索世晖告诉我，他们中文系的庄明泉对他讲，“孙蓬一他们说你们是‘机派’，你们应该说他们才是‘机派’，他们阻挡大联合，是左倾机会主义。”我们这一派在当时“公社”内部是少数派，这一派有：“作战部”的几个人索世晖、王复兴、陈双基、扬子浪、任瑚琏、张绍清、马西沙。有原“66”的一些骨干：刘庆柱、王渊涛、俞政、黄虹坚、曾镇南、庄明泉、金崇顺、王兰亭、王冠英、黄诗云、陈建民、徐森、张文虎、杨桂香、钱凤娟、吴丽珍、孟关霖、程仁双等人。在公社总部有：李文、阎志胜、李长啸、沈永友。还有驻首都红代会的代表马云龙。“公社”总部主要负责人孙月才，虽然是由“联战”推举进入总部，但他比较倾向李文。李文是我们这一派的代表。在聂元梓周围她比较倚重的人中有几名教师：宋一秀、魏杞文、赵建文等，与我们一致。“公社”内部两派斗争发展到68年，我们与孙蓬一的矛盾甚至超过了与“井冈山”的矛盾。但始终处于“斗而不破”的局面，始终控制在内部不同意见争论和思想斗争的范围内。

关于“公社”内部的这种派系分野和思想斗争，“公社”总部主要负责人孙月才在他发表的《文革十年日记》这部书中，第260页的第81条注释关于“李文”的条目中，有清楚的记载。此条目写道：“李文，生物系学生，干部子弟。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他以‘策略派’著称，和孙蓬一观点相左。其人好思，对文革较早取批判态度。1985年3月29日，《人民日报》社居然还派人来上海社会科学院找我调查李文在文革中的活动情况。”孙月才在回复《人民日报》的材料的“附言”中写道：“当李文对文革已有所觉醒时，你们《人民日报》还尽在放屁，文革结束后，《人民日报》有像样的检查吗？”

当时，“新北大人”写作组曾由曾镇南起草了一篇长篇大字报，批判本派的派性，论述实现大联合的必要性，主张承认“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文中批评了本派在大联合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观点。当时“公社”内的大多数还接受不了这些意见，犹豫再三，因担心引起内部激辩，造成分裂，便没有贴出此字报。可见两派联合阻力之大。

在“大联合”的问题上，聂元梓、孙蓬一有分歧。聂元梓主张承认对方是“革命群众组织”，反对“压服”，反对武斗，主张大联合。孙蓬一则坚决反对聂的意见，主张“摧毁”“井冈山”，认为与“井冈山”的斗争是路线斗争，说“路线斗争是不能调合的”，搞大联合是“右倾”。聂元梓在一次“公社”战斗队队长联席会议上，提出“承认‘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实现两派大联合’的主张。结果遭到绝大多数战斗队的否定和“炮轰”。当时的氛围就是这个样子。“井冈山”的一些人流传“公社”分裂为“聂派”和“孙派”。但我们这批人从未承认自己是“聂派”，只承认在内部，更多地支持聂元梓。由于聂比较摇

摆，她在“井冈山”的攻击、谩骂及“公社”孙派内部指责的双重压力下，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反对派性，促进大联合的主张，后来甚至卷入了两派武斗。聂元梓被派性所绑架，始终没能以无比的勇气和智慧挣脱出来，那么她做为处于主导地位的校文革（权力机构）主任，便只能在文革后期吞下苦果，承担打派仗、搞武斗的重大责任。

到了12月，“井冈山”也有一部分人主张有条件地“承认校文革”，实现两派联合。他们有个“天安门论坛”的组织就持这种主张，我和杨子浪曾多次与他们接触、谈判，并于12月25日与他们达成联合举办两派的学习班，商讨两派怎样实现大联合。双方签署了协议书，“井冈山”方面承认“校文革”为权力机构，“公社”方面承认“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当时“天安门论坛”的人告诉我们，陈醒迈（“井冈山”总部成员）下次将参加联合学习班的活动。我和杨子浪也表示会参加。随后，“井冈山”广播站广播了杨克明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支持联合学习班，表示承认校文革的领导，但要求“改组校文革”。（他们“改组校文革”的要求，我们并不认为不合理。）到了12月28日，风云突变，“天安门论坛”突然撕毁了协议，举办联合学习班之事，功败垂成。12月30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井冈山”强硬派突然绑架了校文革结合的干部崔雄昆（新成立的中共北大领导小组付组长、校文革斗批改负责人、原北大教务长），校文革立即举行了抗议大会。两派对立情绪突然升温。自下而上的大联合的希望破灭。看来“井冈山”方面的“大联合派”也是少数派，且压力极大，他们卡在“井冈山”大部分人不同意承认“校文革”是权力机构。“井冈山”总部被强硬派所操控，他们绑架崔雄昆，是有意破坏两派鸽派的大联合努力，把两派斗争推向激化，推向武斗。

当时历史系的两派教师曾相互接触，商讨历史系教师大联合的事。魏杞文找了“井冈山”教师头头李源，说“学校上面两派不联合，咱们历史系先联合”李源赞同，并到魏的家里商量。但在学校两派斗争日益激化的背景下，这种小范围的大联合无法推进下去。

两派大多数人互不承认。不承认对方，怎么联合？这便是当时的局面。由此可见当年派性泛滥之严重程度。所谓派性泛滥，实质是阶级斗争观念的极度泛滥，两派的大多数群众都以宗派为依托，把对方视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即孙蓬一所说的“路线斗争不能调合。”两派都想压倒对方，使自己在运动后期能处于有利的政治地位。当时没有私有产权，人们的利益述求主要体现在本人的政治地位。对政治地位的追逐就是对利益的追求。即列宁所谓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派别斗争十分激烈，派性十分顽固。至于在全国泛滥的派性斗争，其所暴露出来的民间所蕴藏的强烈宗派性，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这应与我们民族深远的文化与传统中的负面因素有关。此问题笔者将在其他章节阐述。

北大的两派斗争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从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全国各地都陷入了派别斗争，武斗升级，运动严重失控。这并非毛泽东的愿望。这证明文革并非始终如一的“毛泽东的文革”，毛不是神，他没料到全国会出现如此大混乱的局面。他在9月16日视察杭州时说，“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他想不通了，蹦出这么一句大白话，他是真的想不通了，觉得不应该这样。因为文革初期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初的全国各地两派斗争，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反省、市委，还是保省、市委。而到了1967年下半年，两派之前都曾共同批省、市委的资反路线，而现在却因为结合不同的干部，或者是斗争策略的分歧，或是争座次，互不服气，争论谁更革命等原因，便重新分裂成两派。而军队却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两派冲突激化，武斗升级。群众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泛滥成灾。这时的两派斗争虽没什么大原则方面的分歧，都反对刘邓路线，都拥护毛泽东的司令部，却比66年的派斗激烈的多得多。杨子浪在1967年1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产生了很多偏激的东西，对立面的两派有时各执一词，闹的不

可开交。”扬子浪的这段“日记”，记述了当时的普遍情景。群众运动并非天然正确，人民群众也会犯错误，那段时间的人民的文革是个错误潮流，无政府主义泛滥，一片混乱，对社会具有巨大破坏性。同时在那时间，群众运动也离开了毛泽东的旨意，离开了毛泽东的文革轨道。毛泽东不是神，运动失控了，他穷于应付。毛泽东1967年夏、秋一再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了，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结束。”“接着召开‘九大’。”但事与愿违，他想结束却结束不了。群众运动脱离了他的轨道，不按他的意志行进。毛泽东的历史观是“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他在文革之初，把“阶级斗争”从“潘多拉”魔盒中放了出来，而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到了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运动严重失控，尔后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了全国军管及工军宣队进驻高校的手段，才控制了局势。军管及工军宣队比之刘邓的工作组，对群众的控制厉害得多。毛泽东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也不是不要工作队领导运动，只不过是要看那个司令部的党领导，那个司令部的工作队。“九大”的召开，比毛泽东预计的时间整整推迟了一年。“九大”结束后，毛泽东又展开了新一轮的路线斗争，文革仍无法结束。

注释（第五章）：

注1：《陈一咨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113页。

注2：《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207、208页，第十一章第3节。

注3：《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426页，第十七章“我的上诉书”。

注4：同上，428页。

注5：扬子浪：《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刊于《记忆》132期2015年6月15日。

注6：《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223页，第十二章第1节。

注7：《记忆》电子杂志第143期“陈伯达1967年6月5日的讲话”。

注8：《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225、226页，第十二章第3节。

注9：《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216页，第十一章第7节。

注10：《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273页，第十三章第10节。

注11：《戚本禹回忆录》664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

~~~~~

【编读往来】

致《文革博物馆通讯》编辑部的信

• 谢定国 •

华新民先生：

您好！

两年多前，在你的鼓励和帮助下，我把我在文革初期在北京大学记下的一本日记，以《扬子浪：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为题在贵刊首次公布（ZK1408c，ZK1409a，ZK1409c和ZK1014a）。在中国当局长期不公开文革档案的情况下，这本日记为文

革研究者提供了一些虽然微小但有用的资料。陆陆续续有一些文革研究者在他们的论文和著述中引用了这本日记中的一些相关记载。

今年年初，我决定把这本日记的原件和其他一些文件捐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回应。一月六日，我在胡佛研究所向胡佛档案馆东亚部主任林孝庭先生面交了我捐赠的文件。一月二十日我收到了由胡佛研究所档案馆馆长 Eric Wakin 签署的英文捐赠协议，东亚部主任林孝庭先生的中英双语的证明和感谢函。林先生的信函较短，全文照录如下：

---

英文（略）

兹证明谢定国先生将其私人文件捐赠胡佛档案馆，成立《谢定国专档》，内容包括谢先生私人日记（1965、1966、1967年）、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在1968年颁发的北大毕业证书、北京大学在1980年重新颁发的学历证明、父亲谢达三自传、妻子钱珠丽女士家谱、家族照片等。胡佛档案馆相信这些文件，将为来自全球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提供珍贵材料。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谨以此信函，向谢定国先生表达由衷感谢与敬佩之意。

（此处签字）

胡佛档案馆东亚馆藏部主任 林孝庭 敬上

---

林先生信函中提到的私人日记，共两本。一本起自1965年1月14日至1965年11月22日，另一本起自1966年8月5日至1968年2月2日。后者即是我在贵刊首发的《扬子浪：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的原件。任何有需要的文革研究者都可以去胡佛档案馆查阅原件。

华新民先生，正如我们讨论过的，随着我们这代文革人的老去，关心文革的人会越来越少。但文革这个话题永远不会在历史的天幕上消失。后来的历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一定会为了人类的福祉绵延不绝地继续研究这个让天地翻覆又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

祝编安

谢定国敬上 2017年1月22日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